

正统的神性与俗性： 论孝信仰的流变及现代转型^{*}

□ 张祝平

内容提要 “孝”是中国人的道德传统、文化标识,也是中国民间信仰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实际发挥着“孝”观念的寄附者,“孝”实践的创造者,“孝”文化的传播者的作用,孝道伦理与民间信仰诸要素和形态既互为表里,又互建互构,形成了独特的“孝信仰”。特别是在“孝治天下”正统思想的主导下,“孝信仰”不仅塑造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基本样式,而且构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神话体系和文化功能,影响和深化民间信仰与当时政治、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形塑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与精神家园。江南地区周雄孝子祭的生成与兴盛,既是当地民众践行德孝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王朝“以孝治天下”政治策略的典型样本与成功实践,一方面,表明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总是与民众的现实需求相呼应,具有很强的文化流动性和社会适应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民间信仰可以与主流价值相向而行,或可作为强化正统秩序的符号象征,为当政者提供向民众传递或灌输主体价值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伦理规范的一种在地化媒介。在当代社会,“孝”的内涵、形态及地位已然发生了显著变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道德和核心价值观仍然需要孝文化的思想资源支持,这就需要对孝文化传统包括民间信仰支持体系进行反思性的重构,强化政府引导作用,推进政府参与、制度规范、法治保障,鼓励民间有序开展与推广孝文化及信仰活动,主动弥合孝信仰与现代文明的裂痕,让重孝崇孝弘孝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

关键词 孝道正统 孝神信仰 历史流变 现代性 批判与建构

作者张祝平,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一、研究缘起

“百善之首,以孝为先”。“孝”,对于中国人而言,可以称得上是最具共识度和最不可缺少的情感体验之一;作为个体社会评价最为重要的道德尺度,孝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世代相袭的一种生活方式^①。中国人的孝德传统历史悠久,但并非与生俱来。一般认为,“孝”的源头可溯至氏族血亲关

系,本意是对先人的生产经验的认同和对先祖权力意志的尊重^②。而由氏族部落生活中孕育生成的经验形态的“孝”(亦称“肖”或“效”),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形态的“孝”,“至迟在商代”^③,这与殷商时代人们特别尊崇祖先崇拜和频繁的祭祀活动有关。在此后三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孝道文化不断获得新要素的注入,“孝”观念的内涵及其道德实践逐渐从“神本”走向“人本”,大致经历了由

^{*}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状况研究》(16AZJ007)。

具浓郁宗教色彩的先祖亡灵祭祀向宗族(家庭)的血缘亲情伦理拓展,再向国家政治伦理延伸转化,以至于成为王朝治国理政之基石等几个阶段。孝道神圣传统的确立及其文化内涵的人伦化、政治化,不仅调和着传统社会天地人关系和家庭(族)内部关系,造成了中国社会普遍的人情世界,而且不断地巩固着以男性为主导的超稳定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文化模式,加固了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所极力倡导的祖先崇拜与秩序结构^④。

近代以降,国门渐开,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正统的孝道文化体系逐渐遭到瓦解,与之相关的观念、物象与实践方式也一度被视为封建时代的遗留物,或新政权新秩序的阻滞者而被挞伐或清除。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一个文化重构和秩序重建的过程,国人以巨大的勇气和革新精神探寻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为可贵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巨大解放,共同理性和包容精神逐步得以确立。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和审视孝道文化的传承问题。包括:孝文化传统的历史意义与现时代价值,孝道传承与改革背景下的社会秩序、社会道德与文化重构,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迁与孝文化的社会适应逻辑,以及孝道传统与村落信仰和乡风文明建设诸方面的关系等,研究成果可谓丰硕。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1)孝道普遍论。即“孝”具有超阶级性和超时代性的特征,“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永恒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无论精英、平民,无论什么时候,都适用,其中也体现出了对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这也就决定了孝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意义^⑤。(2)孝道两点论。认为孝道传统如同其它道德传统一样,都“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进行批判性的重建,探寻现代化与孝道传统的交集,使之有所回归、有所升华,有所重构,以利于良好家风和社会风气的整合^⑥。(3)孝道价值论。认为“孝”是中华文明历史传统美德的精髓,它于中国文化的作用至大、地位至高,“在某一意义上,(中国文化)可谓为孝的文化,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⑦孝文化传统对于当下社会教育、养老等问题,以及和谐社会秩序建设和个人社会化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⑧。

(4)孝道衰落论。特别是一些乡村社会学者认为,随着乡村现代化、市场化改革实践的推进,孝俗与现代法治的抵牾与交融,以及长幼有序的等级秩序、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等孝文化的负功能也在乡土社会日益凸显;同时,人们的宗族秩序和权威观念弱化、平等意识和权力意识增强,社会评价和舆论引导失效或呈现功利化倾向,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衡,再加之城镇化的推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使传统孝文化的固有基础发生破裂和动摇^⑨。

文化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孝道的内涵、呈现方式及其作用、地位必然会发生相应变化,然而,孝道文化的精髓并没有改变,即首要在于对父母及长辈的“敬”和“爱”。当下,在倡导文化自觉和激发文化自信的道路上,传承孝文化、弘扬孝文化、践行孝文化的社会氛围已然日渐浓郁,重建“孝文化”还被纳入到了国家文化战略的层面^⑩。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弘扬孝敬文化是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⑪,可以说,这就是新时代赋予中华孝道文化发展新的历史定位。我们以为,“孝”既是观念的、抽象的,又是实践的、具体的;既是普遍的、宏观的,也是特殊的、细微的;既是历史的层累与传承,也是现实的创造性再现;“孝在生活中”,要把弘扬孝敬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的过程,以时代性、创新性体现孝德传承发展的现代性。总体来看,近四十多年来,学界聚焦孝文化主题,厘清了孝道传统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营造了全社会重新审视、尊重并积极实践孝文化的氛围,推动了重构新型孝文化的社会共识。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已有的研究,或偏重于史料性的分析阐释,停留于历史;或偏重于社会整体价值建构的宏观叙事,而对孝道传统的文化自主性、地域差异性和时代变异性关照不足;或偏重于孝道与现代国家政治、法律等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又或者一味“求古”,存在理论的探究与道德实践不匹配,偏离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百姓的现实生活。如此种种,对于传承与弘扬孝文化而言,其结果往往事倍功半,并使孝文化研究及实践行动常常陷于“漂移状态”和“破碎困境”。

面对当代孝文化传承实践及其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面对弘扬孝敬文

化新的时代际遇,民俗学者以及宗教社会学者也陆续介入相关研究,并提出了比较一致的观点:中国宗教尤其是广泛流播于地方社会的众多民间信仰习俗在其历史演变中,也承载了孝道的思想内容,并使孝文化得以更加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在今天看来,通过民间社会迅速恢复的传统信仰习俗来承载孝敬文化并促进二者的结合,对于丰厚中华孝道伦理内涵和活化孝文化传播形式,以及敦风化俗、感化人心、激励孝行美德等,依然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⑩。其实,这也是发挥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积极作用的应然之义。从历史上来看,孝道伦理与民间信仰诸要素及其形态既互为表里,又互建互构,出现了许多的“孝神”,形成了独特的“孝信仰”。因此,这方面的探讨是必要的、有益的,特别是在信俗文化浓郁的传统乡村,或可走出一条孝敬文化弘扬与民间信俗传承相互融合提升的农耕文化现代化、生活化、社会化之路。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是非常初步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局部的、个案性的讨论也多存在以史论史,或偏重于价值评判和说理性的倾向,而且往往把孝道视为民间信仰的衍生功能,忽视孝信仰的历史本源性和生活本源性,也缺乏对流动的现实社会的关照。有鉴于此,也基于我们对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的长期关注,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在探讨孝道信仰传统之于中国人精神建构的本然性的基础上,结合江南地区盛行的孝神——周雄神格的历史演化及当代状况,考察地域社会民间信仰与孝道文化互动的历史与现实,分析论证当代社会民间信仰承续孝道传统的内生逻辑及潜在冲突,讨论提出置于民众普遍的信俗生活中建构现代型孝信仰文化的方法与路径。

二、“孝”:中国人精神信仰的逻辑图式

中国人是不存在普遍的宗教信仰的,这似乎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公论;而中国人是有着普遍的伦理信仰的,这也是为世人所公认的,其中“孝信仰”就是中国人重要的信仰之一^⑪。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孝”即是一种重要的礼仪,一直被看作是“美德之首要”、“立世之根本”,给国人带来个体安全感、家庭稳定感和社会安定感。一般而言,“孝”主要是指“善事父母”,就如曾子所说的:“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⑫其精髓在于“爱”、“敬畏”以及“责任”,而且这是无条件的,类似于宗教之信仰,实际上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朴素的道德关怀和宗教情怀。溯及孝信仰之本源,既有自然性的、社会性的,亦有宗教性的。所谓自然性本源,即父母子女之间难以割舍的血缘亲情,或者说是人作为生命体的一种本能性的亲近;社会性本源,是指孝观念的萌发,不仅仅代表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之情,还反映了人类社会早期处于蒙昧状态的先民对于生命延续而产生的图腾崇拜心理,即“孝”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而孝的宗教性本源,一方面,表现为孝观念的成长是对神圣的敬畏,即家族、祖先被视为生命及价值的源头,是能够超越生死和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的神圣力量,可以净化灵魂和慰藉心灵,“使人获得一种来自上天的终极关怀”^⑬;另一方面,表现为孝行为首先通过神圣性的仪式固定下来,比如,通过享祭与祈福体现“孝”的仪式,既包含对先人祖宗基业的继承与感情的追思,也是对鬼神崇拜的一种延续与发展,使得对先人的崇拜附着了浓厚的“神化”意味,也奠定了孝信仰的神本基础。除上述种种,“孝”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并不断得以固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本源——国家性本源,也即中国历史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氏族血缘关系在国家形成后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并被以文明的形式有意识地加以强化利用,形成了独特的家国关系,“孝”被深入到国家的观念中,由伦理推及政治,君权、族权、家权混合,“忠”、“孝”互喻,逐步确立起了“孝治天下”的正统思想,且不断理论化、系统化,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稳固的“孝信仰”体系。这个体系几乎涵盖了类宗教信仰的所有要素,包括:(1)较为系统的孝道经典,包括《孝经》、《礼记》和“三纲”学说等经典理论,以及众多的以“孝”为主题的神话传说;(2)确定的祭祀仪式规范,包括祠祭、家祭、墓祭等祭祀类型,以及一系列孝道传统节日、风俗等,并常借用宗教仪轨或与宗教仪式相结合;(3)确定的信仰对象,包括家族祖先、人类始祖、行业始祖,以及具有良好德性的先贤圣人,人们或崇敬其业绩、感恩其恩德,或效仿其忠孝品格,亦或为表达对他人的孝心而崇祀,以示对孝德的敬畏;(4)相对固定的信仰场所,比如,广布于各地的宗庙、祠堂,都



是集体行孝的重要场所。此外,历代王朝还常常以政权的力量或将孝道制度化、法制化,确保了孝信仰较强的权威性,使之内化为人们自身的内心戒律,外化为立身处事的行动标尺,在稳定家庭、社会和国家秩序中持续发挥作用。

“孝”的政治化是中国人孝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孝信仰持续壮大并持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先贤尧舜就以“事亲至孝”、“德孝治天下”而受臣民拥戴,并享万世香火。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时代,孝行已成为推选政治领袖的首要条件。在后世,特别是周以来的建国者和治国者,几乎无不高举“孝”这面大旗的,具体举措主要包括“用孝选官,以孝行政”、“重刑大法,严惩不孝”、“旌表教育,全民普孝”,以及不断将民间祀奉的孝贤大德之神纳入国家祀典等^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佛教入汉以后,官方力促“三教合流”,合力打造孝观念,使“孝”寓于“教”中,“教”寓于“孝”中,不论帝王君主还是臣子百姓,人人学孝、行孝、尽孝,把孝信仰推向了中华民族独尊独盛的高峰。显然,“孝”的政治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久远的历史积淀,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孝道更好地入脑、入心、入行,围绕“孝”还形成了一系列包括行为规范、标识符号、语言和禁忌在内的特别系统,以及“惟孝为尊”的中华文化格局,涵养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同时,我们也看到,孝信仰的繁盛及其鲜明的政治化取向,也逐步的导致了孝文化的异化,尤其是在封建帝制由盛而衰日渐走向没落的年代,随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强化,孝信仰一度沦为维护君主独裁和父权专制的思想利器,在实践中走向畸形化发展,致使愚孝泛滥^⑪。由此,作为“孝”之源的亲情性敬畏也逐渐转化为奴役性(服从性)敬畏,与世人所称道的美德渐行渐远,甚至成为人们弃之不能的精神枷锁。

至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中国孝道传统经历了一个变革与再适应的过程,在涤荡封建专制色彩和批判性重建的过程中,传统孝信仰有断裂有弥合,逐步转向为一种更加主动、自由、高远的新型孝文化。一是主动融入时代洪流,自觉担当民族大义,即“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⑫孝信仰逐步从服务服从专制君权和封建等

级秩序中摆脱出来,转向成为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团结,携手共克时艰的强大精神基础。二是宣扬自由、平等,批判愚孝观念,孝信仰逐步从膨胀的族权和家庭(族)血缘等级关系中摆脱出来,转向基于父子自由平等、解放子辈等新传统的新型代际关系的孝观念^⑬。三是倡导移风易俗,推行新生活,全面推动孝信仰从神本主义传统中摆脱出来,转向人本主义,也即批判神权观念及鬼魂崇拜,反对过分或过多的祭祀,更加强调对现世父母长辈的孝养,且由主要对家庭(族)长辈的孝敬,转向面向全社会的普遍的尊老敬老爱老。近代以来的百年多时间,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动荡多变,孝信仰在激荡中延续,在变革中前行,一直是广大民众守望家园、延续国家和民族血脉的动力之源。

纵观孝信仰观念的历史变迁,从生命图腾与祖灵崇拜而始,到孝信仰的神本化、人本化、社会化、政治化,直至近现代以来国家动荡剧变中对孝文化传统的批判、反思和重构,孝道伦理及信仰之肇始固然有其本然性,但其本质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产物。因此,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国家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变革,“孝”的表现形态、承载方式和内涵、地位、功能等必然随之嬗变。但是,“孝”的观念已然深入每个中国人的骨髓和灵魂,构成了人们精神信仰和价值判断的逻辑图式,“始终是个体德行的基本衡量标尺^⑭。”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和改革开放社会大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孝信仰尽管时有起伏,但始终与新政权的建设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民众的生活改善紧密相连,并在传统与现代的磨合中积极适应、转型提升,为涵养和谐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同时,经济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也为传统孝信仰空间的存续和现代新型孝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⑮

三、孝神崇拜:孝信仰的文化表征 及社会相关性分析

孝神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是孝道伦理在世俗社会中被推崇至极而神圣化的结果。传说中的圣明君主尧舜即是以事亲至孝之美德受到百姓传颂而顶礼膜拜,逐渐祀奉为神者。至今,尧舜祠庙广布,崇奉者众,可谓中华孝道之始祖。据现存可考资料,对舜王孝道及其神化的记载颇为丰富且生动,其神性之孝主要体现为:(1)人性之孝——“忍害尽孝,孝感动天”,以至于“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2)天性之孝——发乎内心,真情实意,把父母顺心满意作为自己最大的宽慰;(3)天子之孝——恭敬孝悌,教化万民,规范天下^②。可见,舜之孝道,已至人伦之极,糅伦理道德、社会道德、职业道德^③、政治道德于一体,是故,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④舜王孝道及其神话体现了先民对于贤人的敬畏及其孝之美德的崇尚和景仰,反映了先民追求和谐、无违的理想生活状态的人生态度,实际上也为后世的孝神信仰建构提供了模板参照和叙事逻辑。我们不难发现,除祖先神崇拜,在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谱系中,传承至今诸人物神,多与孝道有粘连,或为孝子,或为孝子之父母,或为人们为敬孝而赋之于孝事父母的神格功能等,凡与美德善行相关之崇祀行为,几乎都离不开孝道因素(见表1)。从我们课题组近期完成的一项调查来看^⑤,广大民众参与民间信仰活动最主要的活动类型为“祭祀祖先”,最主要的参与动机为“祈求自身及家人平安”,宗(家)族祖先、佛道教诸神及先贤圣人、英雄人物是人们最主要的信仰对象;在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获得感方面,“心情愉悦舒畅”、“更加知礼节守规矩”、“家庭幸福、子女孝顺”等选择频次均较高,而且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在“家庭幸福、子女孝顺”这方面的获得感越来越强。(见图1-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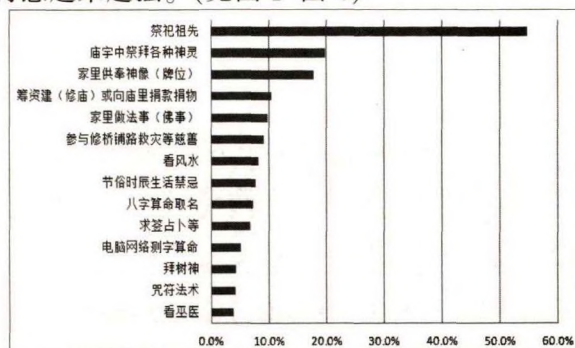


图1 您参与民间信仰活动最主要的活动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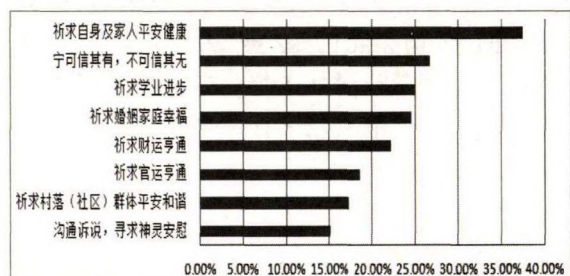


图2 您在民间信仰方面最主要的参与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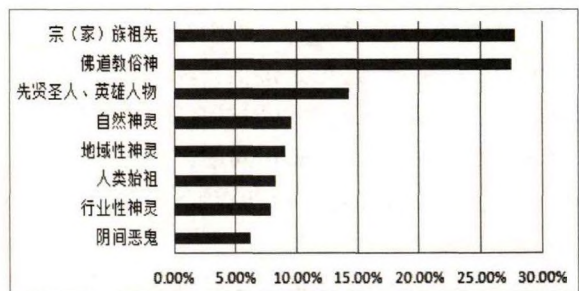


图3 您在民间信仰方面最主要的信仰对象

表1 宋代以来流行于全国的浙江民间代表性神灵信仰

信仰神灵	信仰发源	信仰起始	庙祀起始	浙江地区流行情况			神灵品格
				核心区域	庙祀起始	流行起始	
大禹	浙江地区	先秦时期	唐代	绍兴地区	唐代	春秋时期	大仁大孝
关羽	湖广地区	唐代	南陈	全省	北宋末年	宋元时期	忠孝仁义
天妃	福建地区	北宋	北宋	沿海地区	南宋	南宋中期	孝女
张巡、许远	河南地区	唐代	唐代	海宁一带	北宋初年	南宋初	孝子忠臣
东岳大帝	山东地区	史前时期泰山信仰	汉代	杭嘉湖宁绍地区	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	延年益寿
观音菩萨	中原地区	东晋	唐代	杭嘉湖宁绍地区	唐代	宋代	送子
龙王	中原地区	西汉末	唐代	沿海地区	唐宋时期	唐末时期	孝子
文昌帝	中原地区	东晋	东晋	杭嘉湖宁绍地区	南宋	南宋	孝子
太岁	中原地区	殷末周初	不详	杭州一带	南宋	南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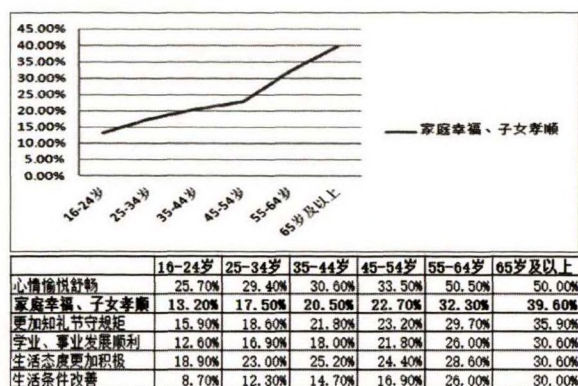


图4 您在民间信仰方面的获得感

因此,从广泛的意义而言,诸神皆可成为“孝神”。而聚焦孝信仰主题,从狭义角度来看,民众所广泛认同、普遍崇祀的“孝神”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因孝行而为孝神。这一类是最为常见和普遍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前文所述之舜王信仰,还有发源于浙西南龙庆景一域的马孝仙信仰(又称马氏天仙、马夫人信仰)等^②。第二,因受孝而为孝神。较具代表性的如山东一域的李龙母信仰^③,以及马氏天仙的家族性孝神信仰体系^④。第三,被赋予的孝神(或因孝信仰而神格迁移之神)。江南地区周雄信仰就是这一类中最具代表性的孝神崇拜之一。无疑,这也是最值得深入考察的一类孝神信仰。在此,我们就以周雄孝神信仰为例,着重分析探讨孝神的历史演化问题,即孝神是何以被赋予的,又是如何流变的,以及其与当时政治社会诸方面的相关性问题的。

第一,孝神何来?据地方文献和现存的碑记史料,现江南一域民众所祀奉之周孝子,确有其人,本名周雄,南宋时期浙江新登县(今杭州富阳渚镇)人,年少在衢地经商,歿而为神。今当地百姓盛传,周雄为大孝子,孝行感天,而且能治病、治蝗、抗暴、救灾、捕虎、除恶等,德行乡野,故而奉之为神,享万世香火。然而,考察比对相关史料,周雄由人而神及其神性演变有多种传说版本。在这当中,又以朱海滨教授所做的史料考证相对系统和完整。据他的研究,周雄在世时或是一位受人敬畏的巫师,在其死后,衢州一域常有灵异事件发生而被推崇为神,此后,其神格演变大致经历了五显神的从神—孝神—江神等几个阶段。诸史料表明,大体在明中期以前,几乎没有周雄孝行传说和孝神祭祀的相关记载,即周雄作为孝神的神格演化和传

播至少是明代中后期的事情了^⑤。据现存可考资料,周雄孝子传说和孝道神格的生成与明代以来中央王朝祭祀政策的转向密切相关,较为严紧的祭祀政策,尤其是经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神灵祭祀的正统性,如祖先祭祀和忠、孝、仁、义之神的崇拜等则属政策鼓励的内容,对于淫祀、淫祠则明令禁止、严厉打击^⑥。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员和士绅深知,对生前并无显著正统性德业功绩记载的周雄神所展开的神祀活动,已难以获得现时国家权力的认同,极有可能被视为淫祠淫祀而遭弹压甚至于捣毁,要使周雄信仰在当地得以维系,必须重塑其伦理主题和精神价值,即发明新的周雄信仰传统,使之契合儒家原理主义的祭祀政策。事实证明,作为国家最正统的孝道恰是维护传统信仰的最好思想武器,在被赋予孝道伦理精神之后的周雄信仰^⑦,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越来越强盛,其祠庙被作为淫祠处理的危险性不复存在,祖庙还被地方官员冠以“周孝子祠”庙额^⑧,成为官方宣传孝道思想的绝好场所,常常从官方得到支持和鼓励,周雄信仰亦转化为“周孝子信仰”,尤其在嘉靖时期,江南一域周孝子信仰日趋繁盛,新建祠庙数量达到历史顶峰^⑨。

第二,孝神何往?明代是一个真正位于转折点上的朝代,对于先前中华文明正统,它有集大成的意味,对于未来,又有破茧蜕变的迹象^⑩,而这与明代商业经济的大发展息息相关。至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在江南三角洲一域已经十分发达,钱塘江一度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以商业、航运为生的人口在江面上往来如织,水上交通作业的繁荣以及其不可预知的危险,直接推动了水(江)神崇拜的兴盛,祭祀群体由商人、船夫向当地百姓普遍的扩散开来,平浪侯晏公、金元七总管、金龙四大天王等是当时人们最为普遍的祭祀对象。而此时,作为地方重要保护神的周雄孝子传说在江南地区已经迅速流播,有了广泛的信众基础,周雄至孝至诚、溺江而亡的故事经由人们不断的发掘和加工创造,其神格亦逐渐地向江神方向发生演化^⑪。据明末史料《稗史汇编》载,其时,民间社会已有将周雄灵异与钱塘江航运联系起来的传说。而康熙初年所制《周孝子碑记》,已明确有周雄系钱塘江保护神的记载,认为周雄神“由于生前纯孝,死后有镇静波涛、平息风浪的灵力”^⑫。这也就

意味着在明中期以后,周雄孝子传说不仅得到了巩固强化,还不断地被衍生创造出了新的传说——钱塘江江神传说,而且,至迟在康熙初年,其神格功能已明显由陆上保护神(孝神)向水(江)上保护神拓展和转化。也因此,使周雄信仰得以更广泛的传播,灵迹传说遍布江、浙、皖、赣诸省域,凡与钱塘江航运有往来之商人、船民,皆有感于周雄神护佑,而成为其崇信者。以至于周雄神获得清政府多次敕封认可,并获供祀于皇帝敕命、地方官员督建的海神庙中,以表彰其作为江神保护航运、护国佑民的功绩^⑥。其实,随着周雄神江神神格功能的渐次凸显,周雄神护佑地方百姓的显灵传说不断地“被发明”和扩散,还被广泛地记载于官方文献中。同时,周雄神孝信仰主题则逐渐隐身于其中,相较而言,作为孝神的神格已经并不突显。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孝子传说和孝道伦理精神依然是维系周雄信仰持续兴盛的核心要素和最大合理性。直至清末新政掀开破除“迷信”的序幕,以及民国时期对“崇拜神权迷信”的大规模查禁取缔,周雄信仰呈现式微趋势,到新中国初期,规模性的周雄信仰活动基本停止。

第三,孝神新生。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国家的宗教和文化政策日趋理性、开放、包容,社会层面的宗教实践活动日益活跃、丰富、多样,周雄信仰也从沉寂中复苏,迅速回归到了江南地区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中。至20世纪90年代前后,江、浙、皖、赣等地周雄信仰主要分布区域的代表性信仰场所陆续得到修建、复建,或扩建。同时,各地周雄庙的复建大多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1)群众愿望迫切,自发组织经由申报程序并获相关部门认可;(2)建设经费由民间自筹,建设用地主要由村集体土地和农户自发捐助自留地两部分构成;(3)建设过程由村民自主管理,全程没有出现纠纷争议^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复建后的周雄信仰场所都不约而同的亮出了孝文化品牌,极力挖掘和推崇周雄孝子品格,于重塑中彰显周雄“孝神”形象。换言之,在新道德、新文化、新秩序的建构中,周雄信仰虽有跌宕,但终获新生,并实现了神格功能的升级转换。即,“开展(周雄)‘孝子祭’活动,旨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从民间发掘孝行孝迹,继承历史沿革,弘扬民族优秀孝道文化。”^⑧显然,孝神周雄的新生,

极大的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道德文明建设的主旨主题,而其江神神格功能的隐退则与现时代当地商品物流交通格局的变化、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等密切相关。并且,因由孝文化主题的凸显,周雄信仰在现时代也不断的获得了合法性认可。比如,周雄出生地——今杭州富阳渌渚镇举办的“周雄孝子祭”活动先后列入了市级、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雄信仰场所“周宣灵王殿”入选了省级重点民间信仰场所等;周雄孝善故事还被编入地方学校教育读本;周雄孝信仰元素不断被吸纳入各地的德孝教育和孝善活动之中,成为接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有效文化载体。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孝神”由人而圣而神,是民间社会造神运动的产物,或者说是圣贤的神圣性被反复塑造的结果,而由中国崇孝尚贤乡土伦理架构起了这一传统的基本叙事逻辑。事实也证明,正统之孝道伦理因由民间信仰神性的塑造而更有活力、更加深入人心。同时,民间信仰神性的张扬还必须不断的回归俗性:(1)与主流价值观相向而行,主动适应政府的祭祀政策;(2)推进周边区域文化交流,形成民间信仰传统的互渗互动;(3)因时而需、因势而需,不断发明出新的信仰传统。因此,中华孝道伦理实际上是混合了神性与俗性的正统化、生活化文化形态。以周雄信仰为例,中国改革开放后江南地区民众对孝神传说的书写,既传承弘扬了传统,又链接了当代正统,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包括:(1)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为当代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合理内核;(2)丰富了孝文化的时代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地方民众重建传统美德的诉求,可以成为破解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一种实践方案;(3)促进了孝道文化的传播,扩大了周雄信仰的社会影响度和美誉度,并以此带动提高了地方性知识的确认度和吸引力。

四、小结与讨论

“孝”是构成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元素,也是塑造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因应于孝道崇拜的“孝信仰”是民众传递和传承传统孝道伦理的重要方式和有效载体,还广泛的被历代王朝主流政治体系所吸纳和“征用”,成为增强民

族国家认同和整合民间社会秩序的正统性力量,独特而持续的发挥着作用。在中国社会近现代化历程中,包括孝信仰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一直在调和、整序,以不断地适应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任务。社会现代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变革,不仅指结构、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生活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并深刻地体现于人的现代化,即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过程,是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⑩。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孝道,以及建构于此的孝信仰的生长根基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就犹如植物生长的营养基发生了改变,其生长形态以及人们利用其而可能获得的价值必然发生改变。同理,孝道和孝信仰在现代社会的生长秩序、社会功能、文化价值等也将不复如旧,以至于传统意义上的孝或将消失。然而,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和“一些物种侵入,另一些物种消失”的生物群落演替不同,人伦道德的演替具有显著的历史层累性和人本主义的创造性,也即它无法与传统决裂,而只能是在利用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创造出更新的传统。以江南地区周雄信仰为代表的孝信仰的流变进一步表明,把传统视为过时的而“一笔勾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是说不过去的,反之,只有当传统与现代相联系和对应时,传统才可以被我们思考和把握,传统的更新与拓展也就不会终结,从而“使现代性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动力”^⑪。

现代性发端于主体的确立和张扬,而孝道传统既发端于人之生物性本然,又外在于中国人主体性建构的客体性世界。先民将“孝”由本然之物而神圣化为“信仰资本”,进而再向孝道普遍化和政治化的功能扩展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对传统的社会共同性价值观进行结构改造和价值重构的过程,即不断确立道德主体性和推进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在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的新时代条件下,孝信仰的回归与转型重塑,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崇孝礼敬的精神需求和情感慰藉,而且依其贴地气的生活化特质,也在客观上产生了孝德伦理教化的实际效果,还促进了地方性知识的激活与传播。但是,孝信仰的回归与再生,绝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主动探寻传统孝信仰文化的现代

性因子,以及现代性视野中的传统因子,为确立和丰富当代人的主体性道德人格,以及其精神机制的再造提供支撑和动力,使孝道文化构成了现代性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资源。正是因为以孝道为核心、以孝信仰为载体的传统的不断更新与现代拓展,使尊长孝亲的伦理文化、和睦乡里的社区文化、凝聚乡情的乡土文化、教化孝义的濡化文化的成长不断获得动力,并由民俗而渐入正统,最终融入现代生活,影响并促进现代和谐文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不断推动着立足传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共同性价值观的重构与生长。

注释:

①⑩张祝平:《“孝”源于社会生活、根植于社会生活》,《富阳日报》2018年10月18日,第5版。

②马中:《中国哲人的大思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③陈筱芳:《孝德的起源及其与宗法、政治的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9期。

④王晓文:《孝文化的历史透视及其现代反思》,《理论学刊》2017年第1期。

⑤参见卜路平:《浅谈孝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及新出路》,《沈阳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魏英敏:《传统伦理与家庭道德建设》,《浙江学刊》1996年第2期;余玉花,张秀红:《论孝文化的现代价值》,《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⑥参见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冯洁:《“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孝文化”的“重构”——以山东S村为个案》,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版,第12-13页。

⑦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⑧赵忠仲:《改革开放以来孝文化研究述评》,《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⑨参见闫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冯洁:《“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孝文化”的“重构”——以山东S村为个案》,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版,第12-13页。

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第6版。

⑫参见詹石窗、李冀《文昌信仰与孝道传播及其社会

疗治》,《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袁瑾:《民间信仰中的孝道传播——以绍兴舜王信仰为个案》,《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3期;张祝平:《“孝”源于社会生活、根植于社会生活》,《富阳日报》2018年10月18日,第5版。

⑬徐新意:《中国人传统的孝信仰及其重构》,《法律与伦理》2017年第1期。

⑭金小燕、傅永军:《谏亲:儒家孝道的“实践智慧”》,《理论学刊》2015年第5期。

⑮叶匡政:《让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孝道》, <https://rufo-dao.qq.com/a/20130713/001921.htm>,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25日。

⑯黄育华、温如昌:《孝——万世周替的中华信仰》,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xyltZJLW/1581919163587KEIH76J7HCJ37JI54J.html>,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25日。

⑰⑱⑲中国文明网:《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http://www.wenming.cn/wmzh_pd/jj_wmzh/201401/t20140127_1720793_1.shtml,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25日。

⑳袁传志:《古代社会“愚孝”研究及其现代启示》,《才智》2017年第26期。

㉑朱辉、李宝艳:《论传统孝道的现代转生》,《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㉒陈放:《中华孝道之祖——舜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a3daa0102wpfh.html。

㉓舜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年轻时从事过多种职业,无论“陶于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还是“灰于常阳”,他都坚持以诚信至上,讲究职业道德。民间还有传说舜是陶器的开创者,因此,在一些地方舜还被奉为陶神。参见《舜与舜文化》, <http://www.yzcity.gov.cn/cnyz/swh/201705/87c215cdf287413292b331e529910d1c.shtml>。

㉔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2011年版。也可参见《《中庸》译文集 十九 舜其大孝》, <https://www.jianshu.com/p/1335fc96687b>,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25日。

㉕此项调查的名称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状况调查”,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一部分内容。问卷主要由三部分构成(1)客评卷(A卷),主要考察“你眼中的民间信仰状况”;(2)自评卷(B卷),主要考察“你自己的民间信仰状况”;(3)认知卷(C卷),主要考察社会公众对民间信仰的属性、功能,以及地方政府在其间的角色等方面的认知和理解。问卷调查主要采取随机抽样和入户的方法,由课题组成员和经过培训的在校社科类大学生利用寒暑假返乡期间实施,浙江省11市民宗干部也积极协助问卷调查工作,在问卷时,辅以访谈、小型座谈、电话征询等方式。调查样本量4500个,实际回收有效样本2800个,有效样本涵盖全国23个省份。

㉖据传说,马天仙,唐朝人,原名马七娘,浙江平阳人,嫁与景宁鸬鹚人(一说其本人为鸬鹚人)。其婆婆对她极不友

善,处处刁难她,而她却毫不在意,处处孝顺婆婆,终于感动了神仙,教她法术,并在一次抵御外寇时,立下大功,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被皇帝敕封为护国夫人。当地人为了纪念她,在鸬鹚横山脚下建了马天仙宫。唐朝的李阳冰曾作有《马夫人碑记》记载了一些她的事迹。至今,浙闽一域还广泛流传着马天仙的事迹,大多与她的孝行有关,供奉马氏天仙的庙宇众多,祭祀活动频繁,其中又以浙南三堆迎神庙会最具特色。

㉗李龙母信仰在山东一域极为流行。相传龙母感孕或食李怀孕生子李龙,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将李龙拉扯养大,母子感情深厚,李龙十分孝敬母亲。母死,龙子移墓葬母,而且凡龙子上坟,云雾毕集,并兆丰年。地方文献记载,道光皇帝曾敕封李龙王“普惠佑民”,未封龙母。但是,地方百姓却敬奉龙母比敬奉李龙有加。实际上是人们为感动李龙的孝行而更加敬仰其母。参见赵玲勤《文登市山东村李龙母信仰及其孝文化传承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㉘在浙西南地区,因马仙信仰及其孝行传说、灵验故事的广为流播,马仙一度被称为马孝仙,成为最有影响的地域神灵之一。并由此,马仙生父母及舅父母也被地方民众赋以神性、立庙祀奉,供信众祈求父母长寿安康、子辈孝顺、多子多福、家庭婚姻和谐美满等。形成了独特的以马氏天仙信仰为主体的家族性孝神信仰体系。

㉙朱海滨:《江南周宣灵王信仰的发生及其演变》,《史林》2008年第2期。

㉚张祝平:《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形态与历代政府控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㉛朱海滨认为,周雄神向孝神的演变是明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之下“伪造”的结果:一是对当时苏州常熟地区周容信仰的附会,时周容信仰作为孝神信仰已被官方认可广为流传,“周容”与“周雄”在江南方言中音同,故地方乡绅向官方举荐纳入正祀时,即把“周容”当作“周雄”;二是对周雄同乡晚辈孝子周德驥孝行的混融,即把周德驥孝行假借于周雄身上,以增强周雄生前道德人格的正统性。参见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㉜参见康熙《衢州府志》(卷31)《循吏·李遂传》。其中记载:“又周王庙多灵应,郡民率走祈福,遂访问知神为孝子,易庙额曰周孝子祠”。

㉝朱海滨:《江南周宣灵王信仰的发生及其演变》,《史林》2008年第2期;董敬畏:《信仰的动态混融——以衢州周雄信仰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11年第6期。

㉞李洁菲:《谈谈明末》,《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30日,第13版。

(下转第80页)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③龚嘉佳、华晨、张佳:《从有机主义到演化理论——漫谈城市规划演化观的构建》,《规划师》2019年第13期。

④周于峙:《城市及其区域——一个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城市规划》2002年第2期。

⑤Aldrich H.E., In defence of generalized Darwinism,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8 (5), pp.577~596.

⑥Bickhard M.H., Campbell, Variations in Variation and Selection: The Ubiquity of the Variation-And-Selective-Retention Ratchet in Emergent 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003(8), pp.215~282.

⑦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立信会计出版社2017年版。

⑧Utterback J.M., Abernathy W.J., A Dynamic Model of Proces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Omega*, 1975 (6), pp.639~656.

⑨Stoelhorst J.W., The Explanatory Logic and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of Generalized Darwinism,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08(4), pp.343~363.

⑩冯健:《杭州城市工业的空间扩散与郊区化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第2期。

⑪厉无畏:《创意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策动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版。

⑫非法租用主要是因为当时纽约住房管理法规规定,工厂建筑不能用作民用,尤其是在设备维护与消防设施都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参见牛维麟《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版。

⑬从燕等:《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探析:以LOFT49为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17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012年9月。

⑭洪玮丹、华晨:《城市文化导向更新模式机制与实效性分析——以杭州“运河天地”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11期。

⑮张环宙等:《滨水区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记忆延续研究——以杭州运河拱宸桥西工业遗产为例》,《地理科学》2015年第2期。

⑯张苏秋, 顾江:《文化产业区域性股权市场与小微文化创意企业融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⑰Bathelt H., et.al.,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1), pp.31~56.

⑱Maskell P., Malmberg A., Localised Learning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2), pp.167~185.

责任编辑 余越

(上接第65页)

⑳关于周雄之死,有多种说法,但大多与溺水有关。如,民国《新登县志》载:“(周雄)贾于衢,闻母病,急破浪以出,为(钱塘江)水所没。”衢,即衢州,位于钱塘江上游。

㉑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㉒王杰等:《大孝子周雄》,《富阳日报》2016年10月17日,第4版。

㉓参见笔者访谈笔录(访谈对象:浙皖赣苏四地周雄研究会工作人员,访谈地点:浙江富阳渚渚镇;访谈时间,2018年10月17日“孝子祭”活动举办期间,访谈人:张祝

平)。同时,也可参见周宣灵王殿理事会编撰:《周宣灵王殿》(内部资料),2016年。

㉔渚渚镇政府:《周雄简介》,http://www.fuyang.gov.cn/art/2018/2/12/art_1385742_27257482.html,访问时间:2019年11月25日。

㉕吴铎:《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296页。

㉖郑杭生:《论“传统”的现代性变迁——一种社会学视野》,《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余越



ABSTRACTS

Wang Yaobin

(Law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Abstract: As the foundation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ree will is the key element of the debate on the subject qualification of AI criminal.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efine its connotation, and i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elf-consistency of the theory to despise or ignore the argument. Based on the modern pan center theory, which thrives on quantum mechanics again, synthetic particles have the property of free will. The free will in criminal law includes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choice and the ability of introspection and control.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choice corresponds to the ability of deep learning, and the ability of introspection and control coincides with the ability of perception. The weak AI entity in the primary stage that fails to independently create the algorithm does not have the above elements and cannot become the criminal subject; the AI like entity has the corresponding level of deep learning ability and rational ability, has the free will in the sense of criminal law evaluation, and has the key elements to become the criminal subject.

Key words: free will; AI criminal subject theory; modern pan-mind theory; deep learning ability; rationality

Reg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Residents' Fertility Willingness

(38)

Wei Jinrui, Zhao Hanlin

(School of Statist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family tracking survey data(CFPS2014) and China's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data(CGSS2015), the impact of reg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n fertility intention has been studied. It is found that: (1)the reg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impact on the resi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the higher reg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individual's fertility intention, but the higher reg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will inhibit the individual's fertility intention. (2)The inverted U-shaped influence of reg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n Resi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region and income, that is, it is positiv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negative in the eastern regions; it is positive in the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s, and negative in the high-income groups. (3)Higher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an improve and inhibit resi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 by reducing the cost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the rate of return on education. High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not only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but also makes young people more eager to achieve their personal goal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generate a strong sense of competition, impetuosity and anxiety, and then reduce their fertility intention.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gional mobility; fertility intention; education investment

Evaluation of Employment Effect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Employment 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CLDS Labor Dynamic Survey

(47)

Deng Rui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Based on the CLDS2014 dat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employment quality such as wage income, labor supply, post stability and welfare benefits. The study find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ge income, soci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wag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but the return on wages of social capital has a certain Matthew ef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supply, social capital cannot directly reduce the labor supply intensity of migrant workers, but it may help migrant workers to obtain non-overtime labor positions with relatively good trea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 stability, social capital does not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signing long-term fixed labor contracts, but the deepening of marketization may help to correc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labor contract specific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benefits, social capital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endowment insurance, but it helps to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urban medical insurance.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capital; multidimensional employment quality; employment effect

Divinity and Vulgarity of Orthodox: Study on the Rheology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Filial Piety Beliefs

(57)

Zhang Zhuping

(Faculty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Filial piety" is the moral tradi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people.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ual cores of Chinese folk belief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folk beliefs actually play the role of the host of "filial piety" concept, the creator of "filial piety" practice, the disseminator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The elements and forms of "filial piety" ethics and folk beliefs ar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 well as constructing each other which are formed a unique "filial piety beliefs". Especially under the orthodox idea of "filial piety rules the world", "filial piety beliefs" is not only shapes the basic styl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olk beliefs, but also builds the mythological system and cultural fun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olk beliefs, influences and deep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beliefs and political, all aspects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shapes the living world and spiritual home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formation and prosperity of Dutiful Son Zhou Xiong's Fete in south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that is, the specific embodiment of the local people practicing the values of morality and filial piety. It is also a typical sample and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ruling the world with filial piety"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it shows that the folk beliefs of local society always correspond to the real needs of people, and have strong cultural mobility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shows that traditional folk beliefs can be opposed to mainstream values, or it can be used as a symbol to strengthen the orthodox order which provided a localized medium for the political ruler to deliver or instill subject value and the ethical norms derived from it to citizens.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connotation, form and status of filial piety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Building modern morality and core val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ill needs filial piety culture as ideological resource support. This requires us to reconstruct reflectively on tradi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ncluding the support system of folk beliefs, to strengthen government guidance,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system standardization, rule of law guarantee of the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and beliefs activities orderly. Mend the rift between filial piety beliefs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actively. Make valuing filial piety, worshiping filial piety, carrying filial piety forward becom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in nowadays.

Key words: filial piety orthodox; belief in filial piety god; historical rheology; modernity;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s in Shared Economy through Information Link, Technology Embedding and Network Effect

(66)

Yang Ge

(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chang 330047)

Abstract: Online network and offline network construct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shared economy together. Information links, technology Embedding and network effects lead to changes in social networks in a shared economy.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shared economy embedded in Internet technology presented the trend of full network development, which eliminated the resource advantages of structural holes and shaped the network community. The surplus value in the shared economy mode transited from the single dime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factory to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in the Internet era, resulting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pattern of the surplus value. Multi-embedding based on technology overlapped with winner-take-all network effect, which homogenized the social network functions in the shared economy. Shared economy provided a broader platform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relations, which were tied by strong relations and extended outward in a differential pattern. Under the shared economy, social individuals can exchange social roles through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social resources can also flow rapidly but briefly among all social strata with the help of Internet technology. Shared economy promoted the sharing of social resourc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ggravates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match the institutional supplies of the shared economy.

Key words: Internet +; shared economy;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Innov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Creative Space—The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in Old Industrial Plant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73)

Zhang Jia¹, Gong Jiajia²

(1.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ngzhou 310015; 2.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Transformation from old industrial plant to creative space is one of the typical urban regeneration, especially along the Grand Canal area in Hangzhou.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to three phases, that is emergent phase, self-initiated phase and co-evolutionary phase, studying the evolutionary population and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n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Identifying the population vari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it finds that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changes from the rental price and physical space to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y of government and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the operator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 In the end, it argues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space is confronted with three obstacles, thus putting forward the relevant approaches to solve the problem.

Key words: creative space production; innovation; old industrial plant along the Grand Canal; evolution

